

“土地廟”隨筆

王 春 瑜



光 明 日 報 出 版 社

“土地庙”随笔

王春瑜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土地庙”随笔

王春瑜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北京昌平展望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60千字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1—4,100册 定价：1.85元

ISBN7-80014-127-6

K·0006

序

很想请一位名流给我的这本小书写个序。但忽然想到郑板桥《家书序》中有这样的话：“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板桥集》第四页。启智书局印本）区区如我，当然连做梦也从来没有板桥那样豁达过，说老实话，既想过“借光”，更不怕“含讥带讪”，但无奈与所谓“王公大人”，素无来往，结识的师友中，有交谊并称得上是名流的，莫过于谢国桢先生和杨廷福教授，廷福学长更是我的挚友。但令人痛惜的是，谢老、廷福兄，都已先后作古了。“上究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求这两位作序，是再也请不到了，于是，也就只好自己扯几句。

读者看到这本小书的书名，叫《“土地庙”随笔》，可能有点奇怪。是否我在故弄玄虚？非也，“庙”中决没有“暗道机关”，更没有诸葛亮式的“八阵图”；也决非步古人风流余韵，给自己书斋起了这么一个“雅称”，因为几十年来，我从来就没有阔绰到居然还有一间书斋。实际情况不过是：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六年，绝大部份时间是在一间孤零零的简陋斗室中度过的，无论其面积和外型——尤其是外型，活像穷乡僻壤间常见的土地庙。我在“庙”中工作、学习、吃饭、会客、读书、写作。说到写作，我是研究历史的，无非写书、写小册子、写论文，但也写些读史札记、读史小品，

还写些杂文甚至散文。这间“土地庙”，前年终于因基建需要，拆掉了，我当然也就搬了家。但是，新居决没有因我是“拆迁户”而声价倍增，升格为“城隍庙”，大体说来，也还属于“土地庙”一类。我很怀念我的旧“庙”。我常常回忆起：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每当风儿吹过，“庙”前的两棵白杨树的叶子，便沙沙作响，像叨叨絮语，轻轻抚慰着我，伴我夜读、笔耕，把我的思路引往知识的汪洋大海中，并不时勾起我的乡愁，引我重温童年的旧梦……我常常想起这首儿歌：“一颗星，挂油瓶。油瓶漏，炒黑豆。黑豆香，卖生姜。生姜辣，垒宝塔。宝塔尖，戳破天。天咬天，地咬地，三拜城隍和土地。土地公公不吃荤，两个鸭子囫囵吞！”我在童年时唱过这首儿歌，直到二十多年前，读清朝文人郑旭旦辑的《天籁集》，看到这首儿歌也赫然在目，才知道原来此歌是古已有之，唱了不知多少年了。这首儿歌是多么清新、别致呵！最后那两句，更是奇峰突起，别开生面，完全出人意外。它常常引起我的遐想。史学研究是很刻苦的工作，但写出来的文章，无论大小，应该耻与人同，务去陈言，给人以清新之感。笔调也应当是流畅的，如果全是八股文似的，人们将有理由怀疑史学家的脸都是死板板的、俨然阴沉木雕出来的无表情的偶像。因此，我一直尝试着，不时写一些争取能够雅俗共赏的史学文章。几年过去了，虽然学问上了无成就，但总算也写了几十万字，并且有很大一部份，都是在“土地庙”中写出来的。敝帚自珍，现在选出一些——大部份都是小文章，无非是研究史事，说古道今，东扯西拉，南腔北调；无以名之，因难忘旧“庙”，遂称《“土地庙”随笔》。如此而已。

这也就是序。

著者，1985年1月31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目 录

序	(1)
“人安为宝”	(1)
说“天地君亲师”	(4)
“语录”考	(8)
烧书考	(12)
吹牛考	(17)
“株连九族”考	(21)
“万岁”考	(24)
读《玉抱肚·官悟》	(33)
读《诏狱惨言》	(36)
慈菇和“万万顺”	(41)
八旗子弟的盛衰	(47)
“崇国夫人”寻猫的风波	(58)
测字·溺爱·挂黑牌	(62)
“洗马”与洗马	(66)
“久任”、“迁转”孰优论	(69)
说称呼	(72)
“浪里百跳”的悲剧	(75)
牛二考	(77)
“发财”考	(79)
薛宝钗与大锅饭	(82)
论探春“改革”	(85)
释“毛兵”	(88)
“边调曲儿”辨	(92)

“拟桃源”解	(98)
《富春谣》作者考	(105)
《禽言》作者考	(110)
“丁祭碑文”作者考	(114)
李自成、崇祯帝“和议”初探	(117)
大顺军与耶稣会士	(125)
说黔兵谋反诗	(130)
李自成登极辨	(132)
史可法行年考	(135)
漫话高氏	(137)
“蒙汗药”之谜	(141)
“蒙汗药”续考	(146)
李岩·《西江月》·《商雒杂忆》	(149)
学生·大师·学风	(157)
说“拉郎配”	(163)
说《卖油郎》	(168)
莫将方志视等闲	(173)
陈守实先生小传	(176)
忆周予同教授	(180)
秋夜话谢老	(185)
施耐庵故乡考察散记	(198)
塔、树之恋	(208)
采石情思	(210)
在郭老旧居的沉思	(214)
夜宿大佛寺	(217)
校后记	(221)

“人安为宝”

据明人都印《三余赘笔》、董谷《碧里杂存》等史籍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创建明王朝之后，每天黄昏派专人在道路上一边敲木铎，一边高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几句话，以提醒行人；五更时则派专人在谯楼上一边吹着“长鸣曼声激昂”的古老乐器——“画角”，一边高唱“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等九句歌词，以告诫臣僚百姓。就后者而言，通称为“画角吹难”。

你看，朱元璋又是派人连敲木铎，又是“画角吹难”，那股认真劲，俨然佛寺里的晨钟暮鼓。其目的是什么？董谷说得好：“无非欲其谨始慎终，居安思危，而免颠沛之苦”。一言以蔽之：希望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社会不要再动荡。

其实，“画角吹难”时高唱的那九句歌词，“著作权”并不属于朱元璋，据都印以及著《事物考》的王三聘考察：“相传为曹子建作。”来源可谓久矣。看来，在中国古代地主阶级政治家中——我说的是政治家，而不是一味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糊涂虫——恐怕没有一个不懂得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的重要性。据南宋王明清《挥麈录》卷一记载，甚至就连北宋仁宗赵祯那样并不高明的皇帝，也懂得安定的政治局面，比起他的那根被某些侍臣视为奇宝的玉带更宝贵，说：宝带不可贵，“中国以人安为宝”。

人们常常称道唐初“贞观之治”那样的太平盛世。其实，不但这类盛世的重要表征是“人安”，也就是人民的生活比较

安定，更重要的是，正是人民安定下来，有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导致“国泰民安”，出现封建经济发展、政治比较清明的繁荣局面。不难想见，如果唐太宗李世民不注意调节地主阶级内部之间的关系，不懂得在领导集团中“上下相亲”对治国的重要性；不注意吸取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从而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的措施，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缓和下来，让生产得以恢复发展，那么，安定的政治局面就不会出现，“国泰民安”的唐初盛世根本就无从谈起。

纵观历史，凡是安定的政治局面破坏之日，就是天下将乱或大乱之时。北宋中叶后，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日趋腐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安定的政治局面破坏殆尽，北宋王朝终于寿终正寝。宋仁宗这个皇帝虽然也够窝囊，但毕竟懂得“人安为宝”；仁宗之后的几代君主，甚至包括南宋的某些皇帝、大臣，则视“人安为宝”为敝帚，在政治上胡作非为，以至于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也随之江河日下。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靖康年间，皇帝对外屈膝，“括金赂虏”，下令“群臣服金带者，权以通犀带易之”。大臣们的金腰带也保不住了，这不能不是个莫大的历史讽刺。如果此时的君臣，还能想起宋仁宗不以玉带为宝，而以“人安为宝”的祖训，真不知作何感想！

国破家亡，百姓首当其冲。北宋的亡国，南宋在残山剩水间苟且偷安的结果，最苦的当然是人民。据南宋庄季裕《鸡肋编》载：当时的“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以致人吃人。“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更为惨绝人寰的是，将人肉制成腊肉，以作军粮，呼老瘦男子之肉为“饶把火”，年青妇女之肉

为“不羡羊”，小孩之肉为“和骨烂”；而通称之为“两脚羊”，庄季裕写到这里，曾悲愤填膺地说：“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我想，就是八百年后今天的我们，展卷读之，也不免掩卷长叹！

毫无疑问，不管是朱元璋的“画角吹难”，还是宋仁宗的“人安为宝”，其阶级本质，是十分明显的：维持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虽然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本质来看，“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是封建社会，在相对安定或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下，对人民群众来说，所受的欺凌、压榨，毕竟比每一个安定局面被破坏的王朝的末年要轻一些，至少还没有沦为“两脚羊”；透过从五代时就发出的“离乱人不及太平犬”的沉重叹息，我们可以充分看出，人民是多么向往长久的安定局面。

俱往矣，古人何足道哉！但是，今天我们在实现“四化”大业中，重听一下朱元璋辈为了“人安为宝”、保持安定政治局面而敲的木铎声以及长鸣的号角声，回味一下“创业难，守成又难”的歌词，也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历史启示，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安定团结”的重大意义。

说“天地君亲师”

真是“余生也晚”。我生之后，已无需诚惶诚恐地对皇帝顶礼膜拜了。但是，封建“皇泽”之长久，决非很不彻底的辛亥革命所能斩断的。直到解放前夕，许多人家还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牌。这个用金漆雕木或红纸制成的渗透封建主义气息的历史亡灵，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

历史学家张舜徽说过：“真正彻底了解天地君亲师五个字的来源和作用，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幕，可算是了解了一大半。”^①此话很有见地。你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吗？就必须了解“天地君亲师”的来龙去脉。

在我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以及稍后的金文中，这五个字还没有全部出现。“天”，甲骨文、金文中均有；“地”，甲骨文中无，金文中有；“君”，甲骨文中有个占卜者的名字叫“君”，但有的学者说是“尹”字；“亲”，甲骨文中无，金文中有，是国名，但许慎《说文》解释为一种果实，就是榛子；“师”，甲骨文、金文中都有，是军官名。——如此看来，在商朝以及西周，“天地君亲师”还没有互相联属。随着封建因素的日渐滋长，以及天道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天地君亲师”的概念愈益明晰起来。《荀子·礼论篇》提出了“礼有三本”的问题：“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亲”字，但是“先祖”正是说的“亲”。显然，“天地君亲师”紧密相联，作为一种精神枷锁，是战国年间形成的，是早期封建社会土壤里孕

生出来的毒草。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日益强化，君主成了人间之神，至迟从明朝末年起，“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差不多已经高踞于每一个家庭的供桌之上了。清朝初年的石成基曾喋喋不休地宣扬：“天地君亲师，此五件世上都该感激，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切不可懈怠，做个忘恩负义的人。”②并写了歌词，要人们“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③他的这首诗，突出“皇恩”，对我们深入揭示“天地君亲师”彼此间的关系，是不无启示的。

“天地君亲师”，哪个字是核心？是动辄声称“皇恩浩荡”的“君”，也就是封建皇帝。按照地主阶级理论家的论调，“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④“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⑤君权是神授的，代表在冥冥中无所不能、主宰一切的老天爷统治人间。这样，皇帝也就成了人间之神。《诗经》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似乎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赐予的，让臣民对所谓浩荡皇恩感激涕零。你看，《红楼梦》中的贾政，在自己的女儿元春当了皇帝的小老婆后，还要挤出几滴眼泪，说出一番肉麻的话来：“今贵人上畅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华、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虽肝脑涂地，岂能报效万一！”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清代的一个笑话。某年夏天，以纂修《四库全书》闻名于世的纪昀，因胖得难耐酷热，脱光上身，在南书房纳凉。偏巧此时乾隆皇帝驾临，来不及穿衣，匆忙躲在御座下，乾隆却一坐就是半天。纪昀“酷热不能耐，伸首外窥，问曰：‘老头子去耶？’”乾隆厉声责问纪昀：“老头子三字何解？”“有说则可，无说则杀。”纪昀一边叩头，一边解释说：“万寿无疆之谓老，顶天立地之为头，父天母地之为子。”⑥乾隆听罢，

心花怒放，才没有给纪昀办罪。纪昀对“老头子”三字的解释，称得上是绝妙奇文，妙就妙在深得拍马术的三昧；奇就奇在为我们道出了“君”在“天、地”之间的位置。有的人还把皇帝与太阳联系在一起，说什么“天无二日，民无二王”^⑦，“前有明君照，后有太阳随”^⑧；连朱由检（崇祯）那样刚愎自用的亡国之君，竟然也有人“以太阳为君征”，将他吊死煤山之日，即1644年的3月19日，定为“太阳生日”，“相聚拜献”^⑨。真是荒唐！

那么，“亲、师”二字，与“君”又是什么关系呢？

植根于自然经济之上的封建宗法关系，是封建统治的重要基础，每个家庭的家长，从来是代行封建统治的部分职能的，君权实际上也就是最大的父权，皇帝就是天下最大的家长。唯其如此，历来封建统治者才那样热衷于宣扬孝道，强调“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夫子就鼓吹“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尚书·洪范》）极力要人们相信：“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宋朝的道学家吕祖谦，更赤裸裸地说：“事君如事亲，……故事亲孝，……忠可移于君。”^⑩至于“师”，没有一个皇帝不是以圣人自居的，其一言一行，都要写进“起居注”，作天下的楷模；而自武则天开始亲自殿试以选拔知识分子任官后，皇帝更成了理所当然的最有学问的人。明太祖朱元璋，吹嘘自己“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授乎！”^⑪并把他的话辑成四编《大诰》，下令家家户户必备，天下百姓必读，每隔三年，京城比赛背诵《大诰》，人数多达十九万余人。这可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推行皇帝语录的运动。

从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天地君亲师”联成一体，而“君”字是中心。这就清楚表明，由这五个大字组成的特种牌

位，是封建专制主义强化的产物，又是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利器。供奉这块牌位，就是供奉皇帝；向这块牌位磕头作揖，就是向皇帝俯首称臣。可以想见，这块牌位对毒害中国人民精神世界所起的作用。显然，只有彻底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才能保证“天地君亲师”这块古老的神牌以及形形色色变相的“天地君亲师”一类的封建亡灵，不会再在人间复活、作祟！

注 释

- ① 《中国史论文集》第189页
- ② 《传家宝》卷1
- ③ 同上，卷4
- ④ 《荀子·王制篇》
- ⑤ 班固：《白虎通义》
- ⑥ 徐珂：《清稗类钞》第14册
- ⑦ 董仲舒：《春秋繁露》
- ⑧ 解缙：《解学士全集》卷1
- ⑨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册引《烟屿楼笔记》卷1
- ⑩ 《御纂性理精义》卷11
- ⑪ 徐祜卿：《翦胜遗闻》

“语 录”考

我国编纂“语录”的资格之老，恐怕是世界第一。

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儒家古老的经典之一《论语》，可以被视为我国最早的“语录”。史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问答之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①显然，《论语》不过是孔夫子及其弟子等言论的汇编，也就是孔丘及其门徒等的“语录”。在汉代，《诗》、《书》、《礼》、《易》、《春秋》，被称为五经，《论语》和《孝经》一样，只被看成是解说经书的传，而到宋代，道学家朱熹将《论语》与《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编在一起，遂成为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史上影响极大的《四书》。

但是，从战国至唐以前，毕竟没有用“语录”二字直呼《论语》之类的典籍，也没有将某个皇帝或名人的片言只语汇编成“语录”一类的书。“语录”的正式问世，是宗教运动的产物。清代考据学者钱大昕谓：“佛书初入中国，曰经曰律曰论，初无所谓语录也。……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支离鄙俚之言，奉为鸿宝，并佛所说之经典，亦束之高阁矣。……释子（即佛教徒）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②这就是说，孕育“语录”这个怪胎的，是和尚。唐时的僧徒，多半不通文墨，为了学佛，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把其师说的东一句、西一句的话，即钱大昕所抨击的“支离”

破碎的“鄙俚之言”，记录下来，奉为经典，经常朗读，死背硬记，这就叫做“语录”。有些“语录”，至今尚存，如《神会和尚语录》，解放前还翻印过。宋代的道学家们，继承了佛学的衣钵；尽人皆知，宋代理学的渊源之一，正是佛教。清朝汉学家江藩，曾将宋代理学与禅门（即佛教）作过一番比较，指出：“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③。宋代道学家的“语录”，是对和尚“语录”鹦鹉学舌的结果。但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宋代道学家的“语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影响上，都是佛教徒的“语录”所望尘莫及的。据历史记载，宋儒的“语录”有《程颐语录》二卷（这是宋儒最早的一部语录）、《刘安世语录》二卷、《谢良佐语录》一卷、《张九成语录》十四卷、《尹惇语录》四卷、《朱熹语录》四十三卷④。但实际上，并不止这几种。周敦颐的《通书》、张横渠的《经学理窟》等，大体上也属于“语录”一类。宋以后，特别是在明代，各种“语录”多如牛毛，诸如陆树声的《适园语录》、蔡璠的《浣滨语录》、赵仲全的《梅峰语录》等等，不一而足。清初李塨曾慨乎言之：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搦管呻吟，自矜有学。”⑤黄宗羲说得更直白：“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从事于游谈”⑥！

“语录”风行天下，泛滥成灾。在“语录”的熏陶下，小人满街走，骗子不如狗。钱大昕谓：“有德者必有言。语录行，则有言而不必有德者矣。”⑦真是一针见血之论！在宋代道学家的心目中，只要读读“语录”，记住一些片言只语，就是有高尚道德的人，而实际上，不过是一帮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小人。清代初年的思想家颜习斋说得好：“宋儒之学，如吹膀胱，以眇小为虚大。”⑧更值得注意的是，“语录”

成了那些拚命向上爬者的进身阶和敲门砖；而在宋代的道学家中，这类人实繁有徒。时人周密曾尖锐地揭露说：“道学之……徒，……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闾（即出征）捍边（即保卫边疆）者，则目为菑材（即蠢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前圣继绝学，……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既仕。（即高官厚爵）……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其气焰可畏如此！……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①。你看，搞经济，保边疆，学文化，一概受到痛斥、鄙视，而注释、翻印《四书》，编编“语录”，就可以自封为“圣人”的忠实继承者，以一等“贤者”自居，“声名”满天下，乌纱捞到手。谁敢“稍有议及”，表示不满，对不起，“其党必挤之”，一巴掌把你打下去。看来，周密的眼光是十分敏锐的，“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完全被他说中了：手捧《四书》、口念“语录”的道学家的横行无忌，显然是南宋王朝国破家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无论是在《论语》还是从宋代直至清代的“语录”中，也有论学论文之语，间亦有真知灼见。但是，“语录”的绝大多数，都是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性命”之学。“语录”风行的结果，使人们只记得“圣人”、名人的鸡零狗碎的牙慧，而忘记或忽略了思想的完整性，更不用说作为一种体系来看了。这是对人类思维的践踏，实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大劫难。宋、明道学家“语录”对人民群众思想的麻醉、毒害，更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朱熹之流，把“语录”宗教化，要老百姓像和尚念经一样苦读，影响尤为恶劣。朱熹在江西